



Г·諾沃格魯茨基 著
А·杜納耶夫斯基

中国战士同志

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中国抗日战争史
中国革命战争史

中国战士网志

中国革命战争史

中国战士同志

〔苏〕 Г·諾沃格魯茨基 著
A·杜納耶夫斯基

紀家俊 韵逸 譯
貝 金 校



解放軍文艺社出版

1961. 北京

Г. НОВОГРУДСКИЙ, А. ДУНАЕВСКИЙ
ТОВАРИЩИ КИТАЙСКИЕ БОЙЦЫ

ВО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СБОРОНЫ СОЮЗА ССР
МОСКВА—1959

中国战士同志

[苏] Г. 諾沃格魯茨基
А. 杜納耶夫斯基 著

*

解放軍文藝社出版
北京旗板寺一號
北京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04號
解放軍報印刷廠印刷
北京阜外馬尾溝九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6 1/4 插圖5 字數157,000字

1961年9月第一版

1961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20,000 定價(3) 0.75元

前 言

本書是記述在俄国十月革命时期，侨居俄国各地的中国工人响应偉大列宁的号召，組成了紅軍国际部队，为建立和保衛苏維埃政权，与俄国革命人民一起，轉战于俄罗斯南部各地的英勇战斗史迹，并表彰了他們在劳动战綫上为苏联人民所立下的不可磨滅的功勛。

書中着重描繪和再現了中国营营長包清山和中国志願兵的許多鮮明生动的形象，反映了中国工人階級高度的階級覺悟、坚强的革命意志、无比的智慧和临危不惧、勇于作自我牺牲等无产階級的高貴品質，以及他們在战斗生活中和苏联人民所結成的兄弟般的友誼。

本書作者Г·諾沃格魯茨基和А·杜納耶夫斯基为搜集中国志願兵的英雄事迹，整整花了三年時間，訪遍了他們曾經战斗过的地方，終於写成此書。本書的出版，不但可以使我們从这些革命前輩們的英勇斗争中吸取无限的精神力量，同时，对于加强中苏人民和軍队的团结，也将是一个有益的貢獻。为此，在中文翻譯本出版的时候，我們謹向作者为了加强中苏友誼而付出的艰巨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謝。

最后，还要說明一下，書中提到的关于中国志願兵的姓名，由于年代久远，又缺少确凿的資料查对，有的只能根据俄文音譯，因而难免有錯誤之处，希广大讀者指正。

解放軍文艺社

一九六一·七·北京

目 录

一	三行字	1
二	万能的“鑰匙”	7
三	历史的前奏和历史的开端	13
四	“同志”，这是个好詞兒	24
五	途中相遇	37
六	在卡茲別克山麓	43
七	莫斯科的傳單	49
八	《大同报》	54
九	十六个地址	69
十	在卡姆別列耶夫卡河畔	77
一一	神机妙算	88
一二	一幅白輓联	94
一三	第一次考驗	100
一四	如火如荼的八月	110
一五	楼房里的战斗	115
一六	死里逃生	123
一七	兩張假鈔票	133
一八	“俄罗斯媽媽”	148
一九	撤退前夕	156
二十	冬天，草原，阿斯特拉罕	164
二一	一周	169

二二	第一批坦克·····	179
二三	神出鬼没的战术·····	185
二四	功勋的一部分·····	190
二五	战争结束了·····	202

一 三 行 字

这是一九五六年夏天的事。我們两个人为了創作上的事情，到罗斯托夫去。那时，对本書的写作，一点关系也沒有。

但在頓河的首府^①我們偶然看到了一份四十多年前的文件，文件上的三行字打破了我们原定的計劃，改变了我們採訪的路綫。从此，这件事占用了我們整整三年的时光。

这份文件就是南高加索的著名革命活动家馬哈拉澤記述国内战争的回忆录。回忆录写得很好，但如果不是其中有三行字提到弗拉基高加索中国营战士的話，也許不会引起我們的注意。据馬哈拉澤看来，中国营在捷列克城的革命斗争中，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一九一八年六月，弗拉基高加索的苏維埃政权也全仗了这个营的支持。

我們在罗斯托夫州共产党档案室会到了历史学家拉揚柯。他把馬哈拉澤这位老布尔什維克的回忆录抄本拿給我們看，还提到中国营的营長姓包名清山。在馬哈拉澤的回忆录里沒有提到包清山的事。但是，拉揚柯在一份档案文件上，却找到了有关这位中国指揮員的一些資料。

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过去，我們只知道紅軍里的中国志願兵的活动，一般都是在我国东部，而不是在南部。在无边无际的西伯利亞密林中，在阿穆尔河沿岸的广大土地上，在烏苏里江边区的荒原里，在沿海区的丘陵間，散布着一幢幢孤零零的中国劳动人民

^① 指罗斯托夫。——譯者注。

的住房；在东部城市的郊区，聚居着中国的移民。也正是在那些地区，无数的中国劳动者，响应了革命的召唤，拿起了武器，同俄国弟兄肩并肩地为苏维埃政权作战。

中国志愿兵支队也曾在我国的中部孤军作战。但是他们究竟有多少人？在战斗中表现得怎样？直到现在为止，谁也不能作出明确而详尽的答复。

我们在马哈拉泽的回忆录里，第一次发现了中国营的正确番号和中国战士作过战的城市名字。

但是，弗拉基高加索中国营应否获得内战时期举世闻名的国际团队的荣誉呢？

包清山是否可以和卡洛立·斯维尔契夫斯基、斯拉瓦亚尔·夏斯吉克、奥列柯·杜吉其、托依沃·安蒂凯年^①并排在一起呢？

这些曾在捷列克城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的中国无名战士的光辉形象有力地吸引着我們，深深地感动了我們，我們決定放弃原计划，沿着弗拉基高加索中国营转战的途径去采访。

拉扬柯以学者们素有的郑重态度，劝我们放弃这种尝试。他是《顿河、库班与黑海纪事》的编者，他知道，有关中国志愿兵的史料非常缺乏。

大概是因为我们对学术界不够了解，所以他所援引的论据并没有对我们起决定的作用。当时，我们天真得很，根本没有考虑到实际的困难。

只是到了后来，困难才显现出来了。当时，我们已经忘记了来到顿河的原定计划，满怀胜利信心到奥尔忠尼启则市去。马哈拉泽写的弗拉基高加索就是这个城市的原名。

我们在星期日到达奥尔忠尼启则市。各机关都没有人工作。看来，这一天是无法进行采访工作了，我们就到这美丽而热闹的

^① 这四位都是苏联内战时期杰出的英雄，但都不是俄国人。——译者注。

南方城市的中央大街去遛達。

剛走了几步——誰知竟有這樣的事！——我們忽然看見一個中國人。這是一位和藹可親的青年人，他穿著筆挺的褲子，漂亮的絲料襯衫，整整齐齐地結着一條領帶。

無論多么善于幻想的人，也不能把這位青年當作一位內戰時期的老戰士。但採訪的熱情常常會促使人們採取完全不合邏輯的行動。當時我們的行動就是這麼可笑：我們徑直朝中國青年走去，侷促地跟他攀談起來。

雖然他的俄語說得不大好，但他還是聽懂了我們的意思。他是一個技術人員，從北京來到此地才半年。他在本地一個工廠里實習。他要掌握一套技術，然後好回祖國去工作。

這個城市里還有中國人嗎？當然有，有好幾個。都是青年，都是來實習的。

至於內戰時期在弗拉基高加索作過戰的中國人，他可沒有說過。

中國青年沉吟了片刻，突然喜笑顏開起來。他說他認識一個本地中國人。這是一個老人，在本地住了很久了，也許能提供很多這方面的材料。

我們立即請他領我們到老人那兒去。

青年人黝黑的臉龐一下紅了，烏黑的眼睛里閃現出了進退兩難的神情。看樣子，他正忙着要到什麼地方去。他不安地望望街尾，顯然，他有重要的事情要處理，難以陪同兩個素昧生平的人去遛大街。

然而，責任心使得他不能推辭。他覺得他有責任要幫助尋找參加過偉大俄國革命的中國人，他應該作一些“犧牲”。

他猶豫了片刻，望了望遠處樹蔭下的長椅，終於答應了我們的要求。於是我們三個人踏上了一條朝上延伸的石鋪街道，朝中國老

人的住处走去。

不知怎地，我們觉得，这位来自北京的青年領我們去会见的老人，一定是一位久經沙場、身历百战的革命战士。他一定会滔滔不絕地对我們講述在年輕的紅軍的旗帜下战斗过的許多中国战士的生动故事。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好象故意和我們鬧别扭似的，这位白髮老人邵謹的一生，过得非常平靜。他这辈子不仅沒有打过仗，甚至沒有和軍隊发生过一点关系。年輕时，他贩卖絲綢和雜貨，在工場里工作，后来当看守員。他在这一带住了很久，可沒有碰上任何战争。他搬到这里来的时候，这个城市已經是太平无事了。

我們問他，在奥尔忠尼啓則有沒有参加过俄国國內战争的中国人。邵謹說只知道有一个这样的人，他的俄文名字叫薩沙，曾經当过紅軍。邵謹拿出薩沙的照片給我們看：軍帽上有紅星，腰間佩着軍刀，显然是一位身經百战的人物。但可惜这位薩沙在六、七年前已經去世了。不过他的妻子还健在。她叫維拉，住在晚市場附近，紧靠着民警局。維拉能够講述很多故事。她的記性跟所有的女人一样，好好歹歹的往事全都記得清清楚楚。

有了晚市場和民警局这样明显的标志，人們閉着眼睛也能找到这位中国战士的妻子了。不到二十分鐘，我們就已經坐在矮小整潔的老太太的家里了。我們說明来意后，她立即从一个小匣子里取出了各种証明書、証件和盖有印信的文件。

“我的薩沙当过赤衛軍，当过紅軍，在民警局服务过，在山里剿过土匪。”維拉·阿达莫芙娜帶着悅耳的南方音調說，“他是一个好人，性情温和，不喝酒。本地人都很尊敬他。……”

“是因为他的性情温和嗎？”

維拉·阿达莫芙娜严肃地看了看我們，說：

“不是因为他的性情，而是因为他打仗打得好。革命一开始，

他就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参了军，到过所有的战线。后来内战结束了，他还带着部队在山里巡逻，清剿土匪。薩沙說：‘我們中国人作事有这么一条规矩：有始有终。事情干完了，才好回家去；事情没干完，非得干到底不可。山里还藏着坏人，怎能回家去呢！’”

我們翻閱着維拉拿出来的旧文件，一張通行証引起了我們的注意，那是中国营营長包清山簽發給中国营第四連連長包清山·薩沙的。

“这就是說，你的丈夫既是連長，又是营長？”我們問她。

“不，那是另一个包清山^①。我的丈夫是薩沙，那是考斯嘉。我丈夫起初在基輔的中国支队里，考斯嘉在一九一八年年初，就同自己的部队在这兒……你們知道，基洛夫多么器重考斯嘉！基洛夫常常去看望中国战士。还有諾伊·布阿契澤……弗拉基高加索的老人們都牢牢地記得中国战士。……”

辞別了維拉·阿达莫芙娜，我們就到共和国的基洛夫和奥尔忠尼啓則陈列館去，想必那兒一定有我們所需要的史料。

不錯，陈列館里是有很多北高加索內战时期的史料，并且都經過了系統的整理和科学加工。許多学者都成功地引用着这些史料。

在陈列館的数百个卷宗里，我們只需要一个，那就是有关在本地作过战的中国战士的卷宗。

然而这样的卷宗就恰恰沒有。陈列館保管員碧柳柯娃和藹可亲的臉上露出了为难的神情。她抱歉地說道：“这兒差不多沒有中国志願兵的史料。”

“差不多”这个詞留給了我們一線希望。我們請她把一切“差

① 中国人同名同姓的極少見。这里很可能由于他們两人的名字讀音很近似，以至譯成俄文时成了同名同姓了。——譯者注。

不多”都拿出来給我們看。

碧柳柯娃一声不响地把三張紙放到桌子上，那是一份證明書和两份陈列館工作人員写的簡短的回忆。

證明書上写着：

楊新向·瓦西里，中国沈阳市工人，当过紅軍，一八八二年生，一九三六年自动申請退休。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五二年在楊什那街十一号养老院养老，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去世。

——摘自劳动工厂职工簿

在参加过苏联內战的中国战士的名單上，沈阳工人楊新向是第一名。关于他，就当时我們所知道的，因而能报道的只有一句簡短而含蓄的話：这个人出世了，又去世了。

老实說，这未免太少了。①

名單上第二名是刘修。关于他，陈列館的材料写得比較多一点：

“他曾在中国支队服务，积极地参加过反对反革命势力的斗争……”

这倒还符合需要。

“他还健在嗎？”我們問到刘修的近况。

“健在。”

① 后来我們了解到，楊新向曾是一位英勇頑强的战士。在我們到奥尔忠尼啓則采访的第二年，《社会主义沃舍梯报》在一篇論述国内战争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在耶尔莫洛夫斯卡車站前沿的一个地段上，战士楊新向勇敢无畏地單獨和敌人的装甲車进行过搏斗。当时他没有手榴彈去炸毀装甲車和噴着火舌的机关槍。但当装甲車开近战壕时，楊新向突然縱身跳上了装甲車，用步槍狠命砸車上的机关槍筒。步槍砸断了，砸得弯曲了的机关槍也不响了。装甲車失去了战斗力，連車带人都当了俘虏。……”

波尼亞托夫斯基在納尔契克市科学研究所《学术論丛》的消息报道栏里（一九五七年第十一卷），也提到了楊新向的名字：“楊新向同志留在山里打游击，在捷列克炸毀了敌后白軍司令部和軍火車……”——原注。

“有地址嗎？”

“沒有。一两年前，他离开此地了。”

这就是說，一个人去世了，另一个人又下落不明。我們的臉上不由得罩上了愁云。說实在的，我們还从沒有受过这样的“打击”。

然而还有最后一份文件。那是特列齐雅柯夫的簡短回忆。下面几行字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一九一八年春，有十个反革命分子，从奥列庚斯科耶村向阿尔洪卡市运送五馬車武器。我們的崗哨把他們扣留了，哨兵打电话到支队部来向我請示。我帶了中国連的五个人到現場去。……”

中国連！回忆录的作者显然是中国連的領導。难道我們还是无緣会到他嗎？

二 万能的“鑰匙”

特列齐雅柯夫就住在本地。陈列館把他的住址告訴了我們。同时我們还抄下了二十个参加过国内战争的老战士的住址，想必他們也能給我們提供一些綫索。

第二天，我們就去訪問了特列齐雅柯夫。后来又在市党委的协助下，請来了一些老战士。据他們說，中国营不仅象馬哈拉澤所写的那樣，在一九一八年六月起了作用，在同年更艰苦的八月，决定捷列克苏維埃命运的时刻，他們还起了更大的作用。当时中国营約莫有六百人。包清山营的战士参加了爭夺普罗赫拉德納亞、格罗茲內、基茲里亞尔、阿斯特拉罕的战役；参加了解放南高加索的战役；还在很多別的地方作过战。

他們回忆起的都是些最普通的事情，虽有价值，但不够具体，

又都是零零碎碎的，很难衔接，就象远在天边可望而不可及的路标一样。凭着这样的路标，怎能找到目的地呢？于是我們只好一天到晚埋头在档案室、陈列館和圖書館里，不住手地翻閱一年一年的陈旧报纸，关于这个，謝尔盖·哥洛吉兹基說得好：怀着激动的心情，翻閱發黃的旧报；只見在字里行間，跳动着历史的脉搏。

但是我們却比詩人困难得多了。在“字里行間”我們差不多沒有發現什么我們所需要的东西。关于中国志願兵的簡訊，在整年的报纸里，有时我們只能找到四、五則。

档案室里的資料实在无法鼓起我們的工作勁头来。因为那兒所搜集的有关参加俄国革命的中国人的史料同样少得可怜。

但总归还可以找到为历史作証的活人的呀！要是能找到这些人，那么，工作就順利得多了。在这点上說，我們这个万能的“中国鑰匙”，就起了很大的作用。不管我們到什么地方，同什么人交談，只要我們說明採訪的目的，人們都欢迎我們，尽力幫助我們。

罗斯托夫州民警局少校阿夫吉恩科就是这样接待我們的。我們曾經跑去請他协助寻找革命时期的中国老战士。

过了不久，當我們剛从罗斯托夫回到莫斯科时，就收到少校的来信：

承蒙囑托，我已在頓河岸罗斯托夫找到了几个人，他們知道不少中国人的事。下面就是他們所介紹的几位：

唐卿三，一八九六年生，現住莫斯科市索科里尼基区。

常發有——彼得·伊凡諾維奇，現住第十国营农庄，或拉兹多尔区拉兹多尔鎮。熟知他的人，都說他保存着很多革命时期的照片。

莫森科·伊凡·伊凡諾維奇（中文姓名不詳），現住納尔契克市，熟識他的人，都說他在革命戰爭中表現得很好。

日后如果还能获得你們所需要的材料，当及时函告。但

目前未能为你们有益的工作多多效劳，甚为抱歉。

阿夫吉恩科少校实在太低估了自己所作出的成绩。他，和所有我们在采访时会见的人们，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说实在的，我们所有的收获，正是他们共同劳动的结晶。

我们的本子上，渐渐地填满了村镇的名字和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沃舍梯人、切禪人、印古什人、格魯吉亞人、阿尔明尼亞人以及中国人的姓名。

常有这样的事：我们查得了姓名，却查不出住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找地址查询处。但是从许多地方打听到的住址也不是全部可靠的。于是我们又写信到北京，请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协助。

我们在信里向中国同志们概述了自己的工作，请他们帮我们在 中国寻找参加过俄国革命战争的中国同志；我们还附上一份名单。并说明，我们认为名单上所开列的人都已经返回祖国了。

名单里有刘澤荣——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早年，他出席过彼得格勒苏維埃会议，会见过列宁，主持过旅俄华工代表大会。他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里（俄文版第三版）提到他的名字时这样写道：“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广东工人代表刘澤荣和張永奎交談。”

名单里还有陈达昆。他的名字我们是在第一届莫斯科苏維埃代表名单中發現的。在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二日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中报道莫斯科工人和紅軍代表苏維埃全体会议时这样写道：“陈达昆同志代表莫斯科的华工向苏維埃俄国致祝詞。”

名单里边还有任夫成。关于他，《貧农报》于一九一八年写道：

“中国共产主义者任夫成把中国劳工組成几个連队，参加反对

捷克白匪的斗争。

“任夫成同志在流落异国、前途茫茫的华工中间，积极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他所组织的连队，活跃在前线，是一支最可靠最顽强的队伍。……”

單堂方也談到过这位中国共产主义者。單堂方这位中国国际部队的战士，现在已经退休养老，我們在塔干罗格会见过他。他說：“任夫成是一个很勇敢的指揮員，打起白匪来可真叫狠。战争结束后，听说他已回故乡沈阳去了。”

……名單里还有楊春。有关他的資料，我們是在皮亞蒂戈尔斯克地志博物館的資料中發現的。他是加入捷尔宾特团的中国營長。

他是否回祖国去了，我們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材料。但我們还是决定把他列入名單，以便多方打听。我們想，也許中国同志們可能找到一些材料。

在名單里我們还提到两个人：中国国际部队指揮員魯义文和政委張海成。

这两位姓名我們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报纸报道：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中国志願兵大会，在群众大会上，指揮員和政委都發表了演說。

这是一九一九年在俄国各地举行的許多群众大会之一。当时北京的代表在法国凡尔賽發表演講，他說紅軍里的中国部队是被迫組成的，还說苏維埃政府阻撓中国人自由返回祖国。他的目的就是破坏中国志願兵的威信。因此，旅俄中国侨民举行集会，向北京代表提出抗議。

在这次群众大会上，一致通过了一項決議，決議如下：

協約国及其仆从企圖誣蔑在俄罗斯的中国国际部队志願組織，这完全是枉費心机的。